

收稿日期:2020-12-06

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接管 与社会改造时期民生建设及其经验

高汝伟

(盐城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时期,高度关切民生问题,在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积极开展失业救济、全面推进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从中积累的聚焦人民关切、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成效由人民评判等民生建设经验,为新时代我们党着力加强社会民生建设,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民生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2-0001-10

作者简介:高汝伟(1966—),男,江苏射阳人,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2.015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一大批大中城市相继获得解放,党的工作重点也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把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的民生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失业救济、发展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以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民生建设经验。这些思想、成就和经验无疑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财富,为新时代我们党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加强和改善民生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时期民生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摧残下,经济崩溃,百业凋敝,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接管城市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异常艰巨的民生建设任务。

(一)城市生产停滞

刚解放的城市中小企业大部分停产歇业,很多大企业,也因产品销路不畅,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全市1.2万家工业企业中只有30%的企业在勉强维持开工生

产。其中机器业工厂企业停产停工的在80%以上,直接涉及人民“吃、穿”的轻工业生产也岌岌可危,机器面粉业的产量只相当于内战爆发前的1/10;产值平均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74%、贸易额大体占到全国总额50%的轻纺业,因原料供应困难、销售市场混乱,也走到绝境^[1]。城市生产停滞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影响。接管后的沈阳由于煤矿生产没有恢复,“发的是炉煤,不好烧,早起做饭困难,还耽误上班”^{[2]91};“工厂的玻璃,叫国民党飞机震坏了,做工的时候很冷。现在造平板玻璃的工厂还没复工,只好暂用洋铁片或木板钉补一下。当然还是冷,而且光线不好”^{[2]92}。倒闭或半倒闭的企业工人,更无工资可领,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饥饿的人群,尤其老人和小孩更是面黄肌瘦,很多工人家无隔夜粮,有的不得不做小买卖或沦为乞丐。

(二)工人失业严重

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失业工人群众庞大。据统计,1949年城市失业人数达400万人,相当于当年全国在职职工人数的一半。“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3]69},成为城市不堪忍受的重负。如,解放前夕“南京120多万人口中已有失业人数约37万人。解放后,依附官僚机构生存的各种服务人员,流入到南京的灾民、流亡学生、逃亡地主、散兵游勇等,又加入了失业的队伍,使全市失业人口超过了50万”^{[4]4}。截至1950年9月底,“全国失业工人共有1220231人,失业知识分子188261人,共计1408492人。此外,尚有半失业者255769人,将失业者120472人”^{[5]1768}。就业是民生之本,以劳动所得的薪金为唯一经济来源的城市劳动群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其面临的生活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同时,解放初期不法资本家妄想置新生的人民政权于死地,利用手中尚有的经济力量,兴风作浪,扰乱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不仅造成各阶层群众人心惶惶,而且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困难,对失业的工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三)文化教育事业落后

旧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权利被剥夺,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解放初期,上海普陀区梅芳里“目不识丁的全文盲占居民人口的54%,达到小学文化程度的仅占居民人口的7%”^{[6]142}。1949年的“北京厂矿企业职工中,文盲占80%,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仅占16%,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4%”^[7]。由于帝国主义文化的侵略,外国教会纷纷来华设立学堂,虽开办的各类学校在上海、南京等城市形成了体系,有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但这些学校的主权全在外国人手中,实施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宣传所谓的“教义”“亲英”“亲美”思想,直接为殖民地经济服务,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色彩。旧中国城市的很多文化娱乐活动,普通老百姓无法参与,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解放前,上海大大小小的剧场、书场、游乐场里,所演出的剧目,很多是宣扬封建迷信、黄色荒诞的,它们既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服务,也是为国民党政府粉饰太平^{[6]57}。解放初期,上海街头书摊存有“大量反动、淫秽、荒诞的旧连环画和旧小说,旧唱本,每天租售给十几万读者,散布大量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堕落的生活方式,严重毒害、腐蚀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尤其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6]191}。

(四)医疗卫生资源匮乏

医疗卫生事业是防病治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事业。旧社会的反动政府漠视人民健康,未建设完整的防疫体系,疟疾、脑炎、霍乱、血吸虫病、白喉、麻疹、天花、伤寒、痢疾等传染病常

年流行,昂贵的医疗费用使劳动人民根本无力就医,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无法得到保障。解放前,上海“全市人口的死亡率达到20%以上”^{[6]225},沈阳“传染病患病死亡率高达25%,人均寿命仅35岁”^{[2]337},青岛医疗单位残缺不全,“各种病床只有1027张,各类卫生人员2152人,市属的各区、县既无卫生所,又无医院”^{[8]564}。妇幼保健工作对很多城市来说几乎是一张白纸,很少城市建有从事妇幼保健工作的专业机构,广大妇女儿童得不到最起码的卫生保健。上海“新生婴儿的死亡率高达120%—150%”^{[6]225}。沈阳“仅有1所妇婴医院,3所医院设置妇产科,产床计30张,专职医师2人,97.5%的产妇靠旧法接生,孕产妇死亡率为1.5%”^{[2]338}。

二、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时期民生建设的路径选择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既定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任务。接管城市后,我们党花大力气解决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烂摊子,努力恢复发展生产、开展失业救济工作、全面推进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待民生高度负责的态度、品格和精神。

(一)恢复和发展生产

加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和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吸纳社会就业人口的重要前提。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将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9]1647}方针,新解放的城市采取了许多恢复发展生产的有效措施。

1. 实施“劳资两利”政策。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既要依靠工人阶级,也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充分发挥劳资双方的生产积极性。1947年12月,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10]1256}。接管城市后,党和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劳资两利”政策,通过贷款、收购产品等方式大力扶持私营工商企业,并号召工人阶级以高度的觉悟和主人翁的姿态带头克服困难、主动团结资方,从而促进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至1949年底,上海私营企业的开业户由6月的25%上升到61.7%,造船、碾米、医疗器械等企业全部开工,“全市私营工业总产值1952年较1951年增长9.87%”^{[6]301}。南京“全市26家较大的私营企业,到1950年3月8日前全部复工生产”^{[4]13},1951年“全市私营工商业发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私营工商业者称之为‘黄金年’”^{[4]14}。“劳资两利”政策借重私人资本主义,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

2. 开展民主改革。1947年10月,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口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到1949年底,全国共计没收2858个官僚资本企业归人民所有,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6]278}。由于我们党规定对官僚资本主义实行有利于生产恢复的稳当接收办法,制定了“不要打烂旧的机构”和“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因而国营企业内部不可避免保留了比较多的旧的痕迹,企业内部损害职工的政治积极性、劳动积极性、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和阻碍着生产发展的现象仍然存在。针对上述情况,中央决定从1951年开始对这些企业进行民主改革,主要任务是彻底废除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形成企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社会关系。民主改革使国营企业生产管理的大权真正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工人群众搞好生产的积极性被广泛调动起来,企业的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据统计,上海经过民主改革的国营企业,到1952年完成工业总产值68.06亿元,比1949年的35.06亿元增长94.1%,净增33亿元”^{[6]288},工业营业额“比1951年增加

14.91%,其中国营工业为140131亿,比1951年增加145.58%”^{[6]322}。南京国营企业发展也很显著,1952年职工队伍比1949年增加了3倍多,生产总值比1950年增加了3.76倍^{[4]17-18}。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激发了工人阶级建设新社会的热情,无疑成为促进国营企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3. 开展劳动竞赛。劳动竞赛是我们党领导组织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工人阶级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全体人民和自己幸福生活的重要路径。城市接管时劳动竞赛主要围绕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在护厂、清点物资、献器材、恢复生产、增产节约、立功创模中进行。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了以发明创造、技术改造、提合理化建议和节约原料为内容的创造新纪录运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据南京市总工会统计,1951年到1952年9月止,“职工群众提出合理化建议及创造发明共达6047件,被采用的有3791件”^{[4]396}。这些合理化建议和创造提高了生产率好几倍,甚至几十倍,避免了单纯以加强劳动强度来增加生产的困境,对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工人身体健康起了很大作用。劳动竞赛推动了群众性生产热潮,创造了巨大财富价值,创造与仿制的十几种过去一向仰给于外国的生产品,每年为国家节省了几百亿外汇支出,增强了中国工业自力更生的信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劳动的看法,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新社会的劳动是光荣的、高尚的。毛泽东称赞说,这“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3]183}。

(二)开展失业救济

做好失业救济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强调,解决数以万计失业工人、贫民、流民饥寒之困,迅速安定社会秩序,“这是一件大事”^{[3]69}。1950年6月,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也强调:“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1]13}从1950年4月起,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成立的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工人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工作,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 以工代赈。以工代赈的工程首先为国家需要举办的工程,以及有益于市政建设的事业,如挖运河、修筑公路、修下水道及清理城市卫生等。由于解放初期,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无法调拨大量财力、人力投入市政工程项目,而这些又是民生急需。组织失业工人以工代赈,工资由失业工人救济金支付,既缓解了失业工人生活困难,使他们在工作中学会各种不同的技术,为再就业提供了保证,又减轻了国家负担,解决了市政方面资金短缺难题,使许多市政建设得到整修或兴建。“武汉用了七万个工作日修筑了长达一万九千公尺南北垵大堤,保障了汛期中全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上海的苏州河自满清以来,河床淤塞,腐臭不堪,经工赈疏浚后,不只增进了市内卫生,而且便利了城乡物资交流。南京失业工人修建了长干大桥,挖修了惠民河并修了二百万公方的堤岸,保证了十九万亩农田的收获。”^{[12]203-204}

2. 转业训练。失业工人中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他们既无文化水平,又无专业技能。解放初上海对12万失业工人的文化程度调查显示:“文盲占17.34%,小学程度占59.10%,初中以上占15.79%,6.77%的人文化程度不详。”^{[6]311}由于文化程度低,失业工人的就业能力和条件相对较差,只能从事体力型的简单劳动,提高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是失业人员成功再就业的关键。为此,各地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会同工会及有关部门有计划地对失业工人进行文化政治、技术业务教育的培训,使之能尽快转到新的工作岗位上。训练的范围涉及会计、统计、俄文、司法、文教、邮电、铁路、税务、公安、贸易、财经、机械、化工、橡胶、建筑、汽车驾驶、电机、机械、矿工、海员、土木测量、拖拉机、缝纫、印刷、市政、纺织、造纸、卫生员、保育员等。至1952年底,仅上海就有近3万名失业工人参加了转业训练,其中的绝大多数成功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另外,沈阳还组织全市迷信职业者参加转业训练,对他们开展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迷信职业者或自愿废弃旧业,由政府安排到新的工作岗位,或自

行转就其他职业^{[2]319}。

3. 还乡生产。城市“用各种各样生产方法是可能解决一部分人的生活,但数量不能太大,如打草袋销路是有,但稻草需要多就很难购买,因此必须开展群众性的广泛动员回乡生产运动”^{[4]194-195}。有条件自愿还乡的失业工人,由失业工人救济处发给证明文件,当地人民政府在可能范围内给以帮助,使其回乡之后,能确实获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在党和政府的号召动员下,失业工人积极还乡生产,基本生活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回返苏北盐城县的失业工人胡长福在当地政府的照顾下,除在自己的田里耘麦以外,还做点小生意作为他生产的计划。部分觉悟程度高的还乡生产人员,认为今天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才能很好地照顾他们的困难,要是在反动时期根本就谈不上照顾,所以对人民政府非常感激,愿意回乡后一定努力生产。据统计,“一九五〇年七月至一九五一年十月底共有一一八、六九九人返回农村”^{[12]205-206}。还乡生产在推动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同时,也把分散在城市的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投入农业生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

4. 互助自救。失业救济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必须依靠群众,实行互助互济,特别是要激发失业人员的内生动力,使它逐渐建立在“人民自助自救”的基础上^{[2]312}。各地城市广泛开展的互助自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开展社会互助。如南京展开数次社会互济行动,1950年春荒严重时,“本市机关部队开展节约一餐饭运动,工人、学生是以一升米、一件衣、一日所得的捐献,掀起了各界劝募热潮,共得捐款12亿余元,粮10万余斤,及其它衣鞋等物资72667件”^{[4]294}。二是组织生产自救。1951年上海参加工厂生产自救的工人达9000多人,成了解决失业工人就业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南京“先后组织了劳动力与半劳动力从事各种手工业与工厂工作,并以贷款方式扶助其小型生产事业,如打草袋、运输、打柴、捕鱼、养猪、贩菜、运粪、榨油、磨面、做粉丝、磨豆腐,及郊区开荒山,挖河渠,筑铁路等,按累计数字,使63600人解决了一定时期的生活问题”^{[4]293-294}。互助自救工作,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患难相助、自立自强的传统美德,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友爱团结,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在精神上也给失业人员以莫大的鼓舞。

此外,在中央“不饿死一个人”的号召下,新解放的城市还对失业人员生活极端困难者,进行了临时和经常的必要救济。据统计,1950年底至1952年9月领救济金人数合计达239985人^{[12]218}。

(三)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3]1083}。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中,我们党深知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重要意义,通过整顿、改造,逐步收回了文化教育主权,使之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

1. 开展革命思想教育。由于受旧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校师生中普遍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落后观念,完全不能适应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我们党接管学校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帮助师生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同社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级各类学校首先取消了国民党设立的公民、党义、军事训练、童子军训练等反动课程,删除了国文、史地等课本中的反动部分,增设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常识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新课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取代封建的、买办的和帝国主义思想影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沈阳办事处、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分别与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了“寒假青年学园”“暑假青年学园”和“青年讲座”活动,为有针对性地改造学生的思想搭建平台^{[2]325}。同时,按照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采取民主的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开展教职员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存在一些缺点,如对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认识不

足,在运动中要求过急过高,甚至采取一些简单生硬粗暴办法,伤害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总的来说,改造教职员思想是必要的,成效也是显著的。广大教师通过“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和工作责任心,初步树立了新的革命人生观”^{[2]329-330},确立了“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2]324}的教育理念,很多教师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学习政治,靠近共产党和民主政府,教育事业呈现出一派崭新气象。

2. 坚持教育向工农开放。为了使在旧社会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的广大劳动人民受到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满足他们文化翻身的需要,我们党提出了“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解放了的城市通过增设新的学校、改造师资队伍、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减轻学费等措施发展学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不断提升。1950年,“南京市教育局制定‘中、小学学生减免暂行办法’后,工农成份入学的学生逐渐增多”^{[4]501}。1950年青岛市小学和中等学校工农子弟都占49%,1951年分别增至54%、55%^{[8]585},基本消灭了失学儿童的现象。各地城市还通过创办工农速成学校、识字班、群众夜校、民众教育馆等措施发展社会教育,大量吸收工农群众,使过去没有机会学习的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得到提高。1949年南京市创办了12所民校,共73个班级、2312人入学,其中工人、店员占90%。到1952年底,参加各类文化学习的干部、职工和农民达20多万人^{[4]501-502}。1950年5月,“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关于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决定》,沈阳市创办2所工农速成中学,招收具有3年以上工龄的工农干部292名”^{[2]328},他们之中有不少学习成绩优秀者升入高等院校深造,毕业后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坚强骨干。

3. 铲除反动文化遗迹。建国初,在许多文化领域还残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烙印,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我们党领导人民对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反动文化遗迹进行了清理与铲除。上海收回了帝国主义者和买办阶级专有的取乐与赌博的场所“跑马厅”全部土地,改造成上海人民观光休息的重要场所——人民广场;修改了以反动人物命名的道路、公园的名称,对反动纪念物或彻底清除拆毁,或进行文字涂抹,或改作他用;改造租书铺摊,取缔反动、淫秽、荒诞图画;对全市剧场、影院、游乐场进行大规模改革改造,使它们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活动乐园、宣传教育阵地,劳动群众在业余有了正当的娱乐活动。沈阳“出动了几次宣传卡车,刷洗国民党的反动标语,制作新的标语、照片与画展;放映新影片,公演《白毛女》《血泪仇》等”^{[2]358-59},还“对旧艺人进行改造工作,将各剧院及茶社的人组成了曲艺协会及旧剧联合会,编出具有新内容的剧12场,新曲61段,对旧剧旧词开始进行审查”^{[2]135}。当然,在清理过程中也不是对旧时代、旧人物的东西一概抹杀,凡对人民有功的依然加以保存。经过对各方面反动文化遗迹的清理,人民的城市终于从内到外焕然一新。

(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医疗卫生工作是人民保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进民众健康和加强国家的建设力量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1951年9月,毛泽东在一份指示中强调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3]176}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的城市全面开展对医疗卫生的改造建设工作,在治理市容卫生、防治疾病、整顿医疗秩序、建立基层卫生组织机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视和关心。

1.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各类传染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实践中,始终把组织军民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搞好卫生防病工作,当作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件大事来抓。城市的接管和社会改造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主要结合大规模防疫运动和大面积的预防接种进行,以危害人民健康的各种传染病为防治目标,整治脏乱差环境,控制病源传播,集中力量消灭和控制天花、鼠

疫、霍乱等急性传染病。通过组织市民大扫除,清除污物、疏通沟渠、整修公共厕所、排除污水,城市的环境卫生条件有所改善,蚊蝇孳生场所被清除,使传染病发病率迅速降低。1951年全国“天花发病数至少均较去年减少了一半以上。在旅大、营口、秦皇岛、烟台、厦门、广州、北京等城市,两年来未发生天花病人”^[14]。1950年沈阳传染病死亡率比1949年降低1.2%,1952年底古典霍乱在沈阳绝迹^{[2]337}。1951年上海全市人口死亡率从解放初期的20%以上降到14.1%^{[6]226}。爱国卫生运动对一般市民尤其是劳动大众进行了普遍的卫生教育,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卫生风俗习惯,使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耻辱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还促进了工农业生产。

2. 开展妇幼保健工作,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妇女承担着哺育生命的重任,儿童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生命健康状况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解放后,我们党和政府对妇幼保健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中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各地城市积极制订妇幼保健政策、建设妇幼保健机构、改造旧产婆、普及新法接生、训练新法接生员和开展妇幼卫生宣传教育,妇婴的健康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1951年上海市区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女性45.6岁,1954年超过60岁;1951年上海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初期120%-150%降为34.1%^{[6]226}。1949年1月,沈阳市卫生局卫生科设妇幼组负责全市妇女、儿童保健工作,结束了妇女健康无人过问的历史。1951年,沈阳“首次在铁西区开展女工保健试点成功,兴办托儿所,解决母婴通勤车,实行生育产假,受到妇女的欢迎”^{[2]339}。妇女儿童生存权、健康权和发展权有了一定保障,调动了妇女投入劳动生产、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更多的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3. 建设专业卫生机构,完善医疗保健体系。面对接管的残缺不全的医疗体系,我们党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预防保健体系建设,以适应人民群众治病就医的需要。城市的接管和社会改造中,各地在接办或恢复相关卫生机构的同时,建设了工人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联合诊所、西医联合诊所、门诊部、工人保健站、卫生所、牙病防治所、血吸虫病防治站、防疫站、传染病医院等医疗防治机构,健全了城市基层卫生组织。为发展医学教育,培训医务人员和培养更多医学人才,新建了医士学校、护士学校、中医进修学校。医疗预防机构的恢复与发展,解决了专业医护人员少的问题,改善了城市的医疗条件,为市民能及时发现和治理疾病提供了条件。1952年南京市卫生机构床位数从原来“280张床位增加到992张,较解放前增加三倍半强(南大、军区、精神病院、产科医院、鼓楼医院的床位不在内;婴儿床也未包括在内)。与本市人口比例,平均每千人有1950年,0.53;1951年,0.9;1952年,1.77张病床。有医务人员667人,较解放前增加68%。……每800市民中有1个卫生人员”^{[4]355-356}。开封“1952年医院床位685张,比1948年增长59.3%,医务人员1357人,比1948年增长78.7%”^{[15]361}。与此同时,针对医务人员思想作风未有系统的改变和医疗事故时常发生的问题,着手整顿卫生队伍,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和形势教育,“从而提高了思想觉悟,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16]49}。

三、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时期民生建设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中保障民生的政策与实践,蕴含了许多值得探讨与借鉴的民生建设经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底色、本色和亮色。

(一) 聚焦人民关切,是开展民生工作的价值旨归

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价值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

在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时期,始终把党的宗旨和群众愿望有机结合起来,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城时露宿街头,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以自己的模范行为践行了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东西”^{[17]173}。对此,我们党保持了清醒的认识。1949年3月,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的重要历史关头,面对进城的新挑战、执政的新使命,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鲜明提出了“两个务必”,告诫全党要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过程中,为了保证城市工作始终是围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展开,以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精神文化和健康需求为中心,党中央将纪律工作和城市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规定,如入城纪律守则、请示报告制度等,还培养了大批城市接管干部、开展整风运动、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严明的纪律对于筑牢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重要意义。很多经手接管金银财宝的同志都自觉抵制物质诱惑,将接收的器材家具等物资都原封不动,如数交还给人民。为了节省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党员干部“首先紧缩,拿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克服困难”^{[6]269},1951年、1952年国家财政连续两年实现了节余。民主改革工作队队员“有的帮助失业工人办临时托儿所,有的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帮助困难职工看病、配药”^{[6]316},体现了党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品格。正因为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时刻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为着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多做福利事业,为群众所需要的各种事业”^{[4]28},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城市民生工作以及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作,才得到较好的恢复和解决。这不仅安定了人心,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而且使我们党和军队在人民中树立了崇高威望,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 依靠人民,是推动民生工作的力量源泉

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政治优势。城市解放之初,摆在党和政府面前有城市的恢复与重建,稳定社会秩序,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保护民族工商业,开展失业救济,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统一财经,实行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等任务,这些都是事关群众幸福的民生工作。面对复杂的形势和繁重的任务,1948年毛泽东致电前线:“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10]1324}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新解放的城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的同时,大力培养工人群众确立依靠自力更生改善基本生活的观念和发展生产的技能。接管城市后的第三天,南京市就召开了工人、学生、文化科学界和工商界4个座谈会,一方面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将目前国家的困难、人民的困难,诚恳地向大家反复说明,团结他们来共同克服困难。另一方面了解群众的实际困难,听取大家关于克服困难、管好城市的意见。事实证明,只有“认真解决职工可能解决的生活问题及公开说明当前困难,才能团结工作,而工人也来支持我们”^{[4]105}。我们党建设城市的正确主张很快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全身心投入建设新生活斗争的广大职工主动为党和国家分忧,有的自动要求减薪,把自己的积蓄借给资方周转;有医生免费为附近群众治疗疾病;有人自发把贫困家庭的妇女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带领她们用自己辛勤劳动改善生活。为了帮助失业人员,1950年4月中央发出救济失业工人指示后,全国广大职工表现了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开展了捐助活动,至9月底仅中华全国总工会收到的各地工人捐款即达2879200余万元^{[5]1768}。“任何困难都将被人民的努力逐渐克服”^{[4]117},群众的内生动力的激发,较好保障了城市群众的基本生活。

(三) 由人民评价,是衡量民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

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3]1096}民生的改善成效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工作始终把群众的意见、诉求和愿望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党和政府相继下发了一大批指示和决定,如《中央关于解决新解放城市粮荒问题的指示》《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工资薪水问题的指示》《中央关于平稳物价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等,为城市民生工作指明了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了70%^{[18]149}。长达多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也宣告结束,“各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1950年3月为100,到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6.6%,1952年12月为90.6%”^{[5]1721},同时人民币成为人民银行的储蓄来源,我们党打赢了货币“淮海战役”,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人民币信用的提高折射出人们因长期饱尝物价波动之苦形成的抢购、失望心理发生了变化,表现的是人民对党和政府由衷的信赖与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解及拥护。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可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普遍认为“共产党不是没有办法”“共产党的确是为人民办事”^{[4]179},共产党人“都是真正全心全意替老百姓做事的”^{[4]317}。

城市的接管和社会改造这段大变革历史虽过去大半个世纪,但给我们留下的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是厚重的,值得珍视的。今天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始终做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情怀和政治自觉,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 [1] 姚会元. 陈毅领导上海解放之初的经济恢复工作[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3(5): 23.
- [2]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沈阳卷[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 [3]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4]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南京市档案局. 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江苏卷. 南京分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5]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50—1957)[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 [6]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 [7] 史言. 解放初期北京职工的文化教育[J]. 北京工人, 1998(3): 5.
- [8]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青岛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 [9]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44—1949)[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1]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 劳动工资和职工福利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4] 高显恩. 建国初毛泽东批转的卫生工作文献[J]. 中华医史杂志, 2000(1): 45.
- [15]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河南卷[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16]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 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哈尔滨卷[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17] 陈云. 陈云文选: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8] 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1949—1956)[M]. 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by the CPC in Urban Takeover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GAO Ru-wei

(School of Marxism,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urban takeover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PC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people's well-being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how to resume the production in an orderly way, how to implement the unemployment benefit program effectively, and how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education, and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so as to guarantee the people's basic livelihood. The CPC has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such as to focus on people's major concerns,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incipal status of the people and people's decis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It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our part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better meet the people's new expect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CPC; urban takeover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ople's livelihood

〔责任编辑:顾国华〕